

文章编号:1674-8107(2017)05-0005-06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语言文字应用工作的开展及其影响

曾建平,黄俭根,邱 斌

(井冈山大学,江西 吉安 343009)

摘 要: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军运用语言文字的整体水平比当地群众要高,红军的到来提升了当地语言文字应用的总体水平。红军开展语言文字应用工作的主要形式是:妇女识字班、军官教导队、政治宣传教育、文艺作品创作等。由于驻扎的时间太短且红军驻地与当地群众的居住区相对独立,红军语言与当地方言之间的接触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语言文字工作经验对建国之初的相关政策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井冈山;红军;语言文字政策;语言选择

中图分类号: H274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7.05.001

红军^①到来之前,井冈山一带的语言文字应用水平较低。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地域阻隔和传播手段落后导致语言文字应用水平难以提高。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介在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九十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百八十里。”^[1]崇山峻岭阻隔了交通,也阻隔了国语的有效推行,并且由于是山区,当时较为先进的传播手段广播因为信号无法进入也发挥不了其应有的作用。(二)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的语言文字应用工作推行收效甚微。清政府开展了切音运动和简字运动,民国政府推出了注音字母,但收效不是很好。一方面表现为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制定工作不完善,推行的语言文字法规条例较少。另一方面表现为已有的规范性方案由于时局混乱而没有得到很好的推行,

比如读音统一会于 1913 年就制定了注音字母,审定了常用字的读音,确定了《国音推行方案》,并编成了《国音汇编》一书,交至民国政府教育部备案。但之后宋教仁遇刺,国内形势骤变,蔡元培辞职,读音统一会的工作停止;之后直到 1918 年,注音字母等方案才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施行。北洋政府时期各路军阀相互混战,政府主导的语言文字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三)教育水平落后,缺乏语言文字规范和推行的专门人才。当时国语师资普遍缺乏,直到 1924 年,在吴稚晖的不懈努力下,上海创办了一所国语师范学校,专门培养国语师资。虽然该校 1925 年春就开学,并招收学员进行培训,但对于全国的师资需求来说,那是杯水车薪。当时的语言文字工作尤其缺乏倡导者和领头人。语言文字应用工作需要积极的倡导者,如福建有卢戇章撰写的《一目了然初阶》(1892

收稿日期:2017-08-11

基金项目:教育部语用司委托项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语言文字应用与社会监管情况调研”。

作者简介:1.曾建平(1967-),男,江西新干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

2.黄俭根(1964-),男,江西吉水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应用量子化学研究。

3.邱 斌(1974-),男,江西信丰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学研究。

^①本文的红军是泛称,指 1927 年 10 月至 1930 年 2 月期间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驻扎的革命军队。既指 1927 年 10 月到达茨坪的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也指 1928 年 4 月朱毛会师后成立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以及后来改称的工农红军第四军。

年)曾在闽西一带流行;河北有王照编写的《官话合声字母》(1900年)曾在华北、东北及南京一带盛行一时。^[3]清朝末年各地先后提出的切音字方案达28种之多^[4],但井冈山一带没有出现此类方案的流行。井冈山缺乏语言文字专家,没有合适的教材,语言文字应用水平的提升很难找到推动力。

一、开展工作的基础

红军的到来,带来了革命,带来了文化和知识,也带来了井冈山地区语言文字应用总体水平的提升。依据以下三个方面的情况,我们认为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①,红军语言文字运用的整体水平比当地群众的水平要高,这是开展语言文字应用工作的重要基础。

(一)部分红军官兵受教育情况好,文化水平较高

通过对既有资料的统计得出,参加井冈山革命斗争的知识分子至少226人,包括17位大学生,99位军校毕业生,78位中专生,70位中学生,12位初小文化者,以及7名“洋味”人物。如果考虑到疏漏和重名等因素,实际的知识分子人数可能更多。^[5]

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人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各自有在北京、南京、上海、武昌、重庆、青岛等高校的学习经历。比如北京中法大学的陈毅、山东青岛大学及武昌中山大学的罗荣桓、北京大学的李却非、伍中豪、邝邝、谭衷、刘霞、北京师范大学的邓贞谦、北京私立国民大学的朱亦岳、上海大学的何挺颖、上海复旦大学的游雪程、南京南方大学及上海法政大学的谭梓生、重庆中法大学的徐彦刚、湖南益阳信义大学的曾士峨、上海持志大学的王良、湖南南华大学的周鲂等。^[6]军校毕业生中有41位接受过良好的军事理论和文化教育的黄埔军校生,他们是:卢德铭、张子清、余洒度、苏先俊、伍中豪、王尔琢、林彪、徐彦刚、陈浩、陈毅安、张宗逊、谭希林、陈龙鹤、范树德、曾士峨、游雪程、刘型、王良、陈伯钧、吕赤、徐恕、黄子吉、王展程、朱

云卿、杨至成、刘之至、唐天际、戴诚本、肖劲、朱舍我、段辉唐、袁崇全、陈东日、邝邝、李天柱、陈俊、曹福昌、刘铁超、资秉谦、邓萍、贺国中等。^[7]良好的文化教育水平与语言文字应用水平是正相关的,红军中知识分子的人数较多,文化水平高,意味着红军语言文字应用的总体水平也相对较高。

另有7人则不仅接受了汉语文化教育,还有海外经历,掌握或学习过德国、苏联、法国、比利时、印尼、朝鲜等国的语言文字,他们是留洋学生朱德、陈毅、何长工、王如痴、史训川等,以及归国华侨朱云卿、朝鲜人陈龙鹤。朱德1922年赴德国柏林留学,1925年赴莫斯科学习军事,1926年回国;陈毅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何长工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去比利时做工,1924年回国;王如痴1926年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转入苏联红军陆军大学学习军事,1928年奉调回国;史训川1924年受党组织派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朱云卿1921年到印度尼西亚打工,1924年回国并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陈龙鹤是朝鲜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在中国求学,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8]这批具有海外背景的知识分子开阔了井冈山红军的语言文字视野。

(二)当地群众人口少,受教育机会少,文化水平较低

井冈山斗争时期当地群众人口少,经济规模小。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1928年11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曾指出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1]井冈山周边乡镇的人口也不算太多,比如遂川县的草林镇有一个红色圩场,《井冈山的斗争》提到“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1]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如何维持基本的生存是当时面临的重大问题,因而当地群众较少顾及语言文字应用水平的提高。

当地群众接受教育的机会少,文化水平低,文盲占绝大多数。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

^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间跨度为1927年10月至1930年2月)坐落在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主体包括六县一山。六县指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以及湖南的酃县、茶陵,一山即井冈山。鼎盛时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余万,武装割据势力一度扩展到吉安、安福的各一小部;另外,万安、泰和、桂东、资兴等县的边界地段都曾是根据地的外围屏障。(参见余伯流、陈刚《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9]当时井冈山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群众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教育,没有文化,也就谈不上较高水平的语言文字应用。文化教育水平低,体现在语言文字运用的水平上,不会说国语,不能识写汉字的人占了大多数,而会说国语、能识写汉字的人,其国语的标准程度,文字使用的水平都不尽如人意。

(三)红军留存下来的文字材料比群众留存的要多

红军离开后,留下了很多标语、口号、布告、公文、笔记、档案资料、楹联等文字应用材料。根据我们的考察,现有的留存物件中,红军书写、印刷或制作的相关文字材料要远远多于群众的。这些文字材料中,标语的留存量很大,这和红军对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视有关。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提及:“文字宣传,如写标语等,也尽力在做。每到一地,壁上写满了口号。”^[10]当时的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写道:“……其外一组为文字宣传组,两个人每人提一个石灰桶,大小毛笔各一枝,凡军队经过的地方,墙壁上要统统写满红军标语,写字要正楷,以愈大愈好……”^[10]

二、开展工作的主要形式

尽管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条件非常艰苦,缺乏语言文字专门人才,也没有语言文字教学经验和相关的教材,不过当时的革命政权还是十分重视识字教育和扫盲教育。1928年10月,湘赣边界党的“二大”决议案指出:“特委要组织教宣委员会,制定训练教材,计划每周的训练工作……同时要做起字运动,以提高工农同志‘写’‘看’能力”。^[11]除了直接对语言文字教学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井冈山红军为了做好政治宣传、军事训练或文化教育等工作,也需要借助于语言文字等工具,这种频繁的、大量的语言文字应用,在客观上一定程度地提升了语言文字应用的水平。以下是根据地开展语言文字应用工作的四种主要形式。

(一)妇女识字班

不仅红军官兵要学习文化,识写汉字,广大群

众也需要这方面的教育,值得一说的是当时甚至出现了针对妇女的识字班。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二克茶陵城后,时任工农兵政府妇女部长陈叔同^①,为争取妇女学文化的权利,办了一个妇女识字班。关于这个妇女识字班的教员、学员以及活动情况在现有的文献资料中鲜见说明,但无论如何这是一次专门的语言文字推广活动,也是当时分类教学的一种尝试。

(二)军官教导队

工农革命军从茶陵回到宁冈后,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毛泽东同志决定创办一个军官教导队,培养和训练下级军官以及边界各县的赤卫队指挥人员。1927年12月底,军官教导队创立,设在宁冈县的龙江书院,吕赤担任队长,蔡钟担任教导队党代表,陈士渠、张令彬、陈伯钧等担任区队长,从部队中选拔了袁炎飞等人担任教官,学员共计100余人,都是从部队及地方武装中选派的班长和积极分子。军官教导队不仅学政治,学军事,也学文化。文化方面的学习往往与政治学习结合起来,比如解释“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统治”、“实行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建立红色政权”等政治口号,另外也开展识字活动。

(三)政治宣传教育

语言文字作为表达思想,传递信息的载体,在政治宣传教育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群众文化水平低,文盲多,针对这种特点,毛泽东同志要求各级干部要学会运用群众的语言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宣传教育。1928年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前,毛泽东同志亲自审阅了由陈正人起草的工农兵政府的政纲,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政纲进行了修改。例如将“不虐待儿童”改为“不准大人打小孩”;将“废除买卖婚姻”改为“讨老婆不要钱”;另外,群众不知道“土豪”的意思,就用“财东”“有钱人”代替。^[12]这种用群众语言进行政治宣传教育的方式是语言文字应用的细小的改革和创新,也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语言文字应用方式。

(四)文艺作品创作

红军有时会组织文艺演出活动,与工农群众一起联欢。文艺演出的主要节目有:曲艺春锣词

^①陈叔同(1930-1976),茶陵县马江浪滩村人,1927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毛委员带兵打文家市》,莲花闹《反对帝国主义》,渔鼓词《推翻国民党最后得解放》,新五更《邓英自叹》,话剧《打土豪》《活捉萧家壁》等。^[13]这些节目都是很好的文艺创作,涉及语言的运用。这种创作活动无疑会推动语言文字应用水平的提升。

三、对当地方言的影响

井冈山本有的人口群体有两种:土籍和客籍。土籍说赣语,客籍说客家话。土籍和客籍之间素有矛盾,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就此指出:“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1]土客籍的矛盾反映在语言上,也是各自相对独立,虽然有语言接触,但没有出现语言融合现象。

红军的到来使当地的人口比例发生了变化。1928年4月,朱德的部队有2000余人,湘南农军有8000余人,毛泽东的部队有1000余人,袁文才和王佐各300人,全军共计一万余人。^[10]相对于井冈山原来的“人口不满两千”,红军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当地土客籍人数的总和。但这一万余红军官兵使用语言的情况并不一致,因为这支军队的来源比较复杂:有潮汕叶挺、贺龙旧部,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江、浏阳的农民,湘南的农民和水口山的工人,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边界各县的农民。^[1]来自方言区的红军官兵自然说各自的家乡话,不同方言区的官兵之间交流一般用国语(或官话)。

(一)个人使用语言的情况

从个人使用语言的角度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语言使用情况比较复杂。当地群众分别说各自的方言:土籍人说赣语,客籍人说客家话。军队内部通用语是国语,小圈子内部会使用各自方言。

1. 个人选用语言的策略大致有四种情形。(1)未受过教育的当地农民因为不会说国语而自然选用方言;(2)红军官兵内部一般使用国语;(3)不会国语的红军官兵使用各自的方言;(4)红军官兵与群众交流根据情境选用国语或客家话等。

另外,外民族语言一般不使用,之前提到井冈山有海外归国人员和外国人,陈龙鹤是朝鲜人,但没人和他用朝鲜语交流。

2. 个人的语言能力分作三种类型。(1)单方言型。语言能力弱的人使用单方言,和同方言人交流不存在问题,与他方言人交流有障碍。(2)多方言型。语言能力较强的人使用多方言,依据语言能力的强弱,少则两种,多则四五种甚至更多。(3)国语加方言型。接受一定文化教育或语言学习能力较好的人会说国语,这大大拓宽了他们的交际范围。

(二)红军语言与当地群众语言的相互影响情况

1. 红军语言点的类型比较特殊。红军语言点不是语言岛,说其是语言船或许更合适一些。因为其空间上不固定,流动性较强;其组成人员的流动性也很强,随时会有减员,也不时会吸收新成员。红军官兵来自多个方言区,红军内部所使用的方言有可能是赣语、客家话、湘语以及官话等等。不同方言区的官兵进行言语交流,一般使用国语。如果要确定一种红军的通用语言,那就是国语。鉴于当时国语的推行效果不算太好,官话(包括北方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等)就算是比较标准的国语了,许多红军官兵都是操一口五花八门的地方腔国语。

2. 红军语言对当地方言的影响。红军语言对当地群众的语言没有产生太大影响,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红军在井冈山驻扎的时间太短。红军1927年9月底开始进入井冈山,到1929年1月,主力红军就撤离了井冈山,只留下红四军第32团和红五军一部,留守的红军主要是在深山密林中坚持游击战。1930年2月,随着袁文才、王佐的被错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基本结束。红军在井冈山的两三年时间,对当地方言不足以产生影响。二是红军居住地的相对独立也说明其语言不会对当地话产生太大影响。出于政治和军事安全的需要,红军的居住地与当地群众的住宅是有一定程度隔离的,群众不能随意进入红军营区,红军一般也不经常与群众进行言语交流。在这种情形下,红军语言不会对当地方言形成过多影响。

3. 当地方言对红军语言的影响。出于政治宣传、文化教育、军需物品购置等工作的需要,红军必须与当地群众进行语言交流。由于有很多红军官兵都来自井冈山周边地区,他们的家乡话就是客家话或赣语,这些红军官兵可以用方言与群众

交流。也有很多红军官兵来自其他方言区,由于他们的家乡话不是客家话或赣语,为了在工作或生活中与当地群众顺畅交流,则必须学习使用客赣方言。在学习客家话还是赣语问题上,我们认为主要学习的是客家话。因为从政治和军事立场上看,客籍主要亲红军,土籍主要亲白军。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对土客籍的立场做了很清晰的描述:“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1]客籍百姓拥护红军,红军官兵当然学用客家话的多。

四、对建国后语言文字政策的影响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经验对建国后的相关政策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这个表述。

一方面,井冈山走出了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党和国家的许多大政方针的决策和实施都由这些领导人和领导干部主持或参与,包括语言文字工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一手创建的。从井冈山走出去的开国将领有57位,其中元帅5位(朱德、彭德怀、林彪、陈毅、罗荣桓),大将3位(粟裕、黄克诚、谭政),另外还有上将15位,中将21位,少将13位。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出了多位建国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产出很多在党和国家的重要岗位工作的领导干部。建

国后语言文字大政方针的决策有他们的参与,井冈山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经验是这些领导人决策时可供借鉴的重要依据。

另一方面,建国之初的语言文字应用情况与井冈山时期有类似之处,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经验值得借鉴。建国初期的语言文字工作任务艰巨,其中很多问题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问题有相似、相关之处。在语言文字规范和改革工作的政策上,井冈山工农割据政权的经验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在语音规范化问题上,井冈山时期红军使用国语,建国以后则推广以国语为基础的普通话,都以北京音为标准音。2.在文字规范化问题上,赞成简化。井冈山时期繁体、异体、简体、俗体混用,遵从群众的文字应用特点和习惯;建国后推行简化汉字政策,方便了汉字书写。美中不足的是二简字,提出“广大群众对汉字进行的简化,充分显示了群众的创造精神和丰富的智慧。从事汉字简化工作,就是要总结群众创造简化字的规律,应用群众简化汉字的方法,在广泛搜集群众中流行的简化字的基础上,对汉字进行整理和简化”,这是一次对群众创造力的滥用。3.在识字教学方面,由于民国政府的拼音法式没能在井冈山地区推行,农村地区普遍缺乏文字拼音教育导致教学效果不佳,建国后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制定并大力推行了汉语拼音方案。4.在语言规划的其他内容方面,比如第一外语的选定。虽然井冈山基本不使用外语,但由于很多中央文件的原版是俄语,因此井冈山时期实际上的第一外语是俄语,建国之初确定俄语为第一外语。

参 考 文 献

- [1]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A].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3] 赵慧峰.简析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J].民国档案,2001,(4).
- [4] 凌远征.拼音方法的演进[A].新语建设史话[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
- [5] 朱荣兰.试析知识分子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的重要作用[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0,(5).
- [6] 朱荣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大学生[J].党史纵览,2009a,(11).
- [7] 王旭宽.井冈山上的黄埔生[J].党史博采,2008,(4).
- [8] 朱荣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洋味”人物[J].湘潮,2009b,(11).
- [9]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A].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0]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A].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11] 李小三.解读井冈山[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7.
- [12]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写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根据地(上)[M].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 [13] 范国盛.井冈山时期以革命教育为主的群众教育初探[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2,(2).

The Language and Letter Use Works in Jinggangshan Revolutionary Base and Its Influences

ZENG Jian-ping, HUANG Jian-gen, QIU Bin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Ji'an 343009, China*)

Abstract: In Jinggangshan Revolutionary Base, members of the Red Army enjoyed higher literacy than local mass people, and their arrival improved the language and letter use proficiency of the locality. In their literacy-improving endeavors, four major approaches were employed, namely, literacy class for women, officers' training team, political publicity and artistic works. However, due to the Army's short stay and the scattering housing of local people, lingual contacts between the Red Army and locality are limited to certain extent. Nevertheless, the experiences obtained during the period had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the literacy policy of the Republic.

Key words: Jinggangshan; Red Army; language and letter policy

(责任编辑:石劲松)